

四川成都方言亲属称谓语研究

吴瑶

(郑州大学, 河南省, 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汉语中亲属称谓语是依据血缘和婚姻关系建立的一套专门的称谓名称, 兼具语言与文化双重特性。首先, 它在语音、构词方式和语义内涵等方面反映了语言本身的特质。此外, 作为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亲属称谓语也体现了特定地区的独特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地区的方言在亲属称谓语方面存在差异, 这不仅揭示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认知, 还深刻反映了各地不同的地域人文风貌。本文以成都方言的称谓语为研究对象, 特别关注其亲属称谓语部分。通过深入研究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的语音、词汇和语用等方面,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地的习俗、民风以及隐含的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语言学的发展, 还有助于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 成都方言; 亲属称谓语;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四川省, 简称“川”或“蜀”, 地处我国的西南盆地, 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民族构成丰富。四川方言, 主要通行于四川地区, 属于汉语七大方言区之一的北方方言区的一个次方言。四川方言按地域、行政区划可分为四个大的片区, 以成都、绵阳为代表的川西北地区, 又称之为西南官话区。作为四川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成都所使用的成都话因其所具有的普遍性而成为四川官话的代表方言。方言是一个地区文化和风俗的重要载体, 而亲属称谓语则是这个载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属称谓语是词汇系统中的标志性成分,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学和语言学意义。从文化学的角度看, 亲属制度是文化现实的具体体现。称谓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亲属称谓词则是用来描述人际关系中亲疏和长幼关系的词语。它们不仅反映了个人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和角色, 还揭示了人们的自然属性、人际关系和社会观念。它们的形成与地区的特色、传统习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亲属称谓词在方言中属于汉语的基本词汇。它们的使用频率高、历史悠久且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一、成都方言亲属称谓系统

(一) 祖辈

成都方言中祖辈一般采用“公、婆”的方式来称谓。称曾祖父、曾祖母可以统称为“祖阻”。曾祖父的父母可以称谓“高祖阻”, 高祖父母以上的长辈就再没有什么专门的称谓了。称祖父和祖母为“爷爷、奶奶”。称外祖父、外祖母为“外婆、外公或家家/家婆、家公”。在《西蜀方言》则为“家公”、“外公”等, 以及“家婆”、“外婆”等。[1]《西蜀方言》是十九世纪时期, 英国传教士钟秀芝编写的一本关于四川成都方言的著作, 对研究那个时期的成都方言以及四川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有关于称呼“外祖父、

外祖母”为“家公、家婆”的现象。《颜氏家训·风操》：“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为家公家婆。”这种称谓方式至今仍然保留在西南官话和一些南方方言中。亲属称谓内部整个系统是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如果确定了某类亲属关系，那么由这类亲属关系而构建的一系列亲属称谓都能类推它们的称谓意义。如“xx公(亲属称谓)”、“xx婆(亲属称谓)”类，一般是实现结构，那么可以类推其它的“xx公”、“xx婆”结构的称谓意义。我们也可以根据排行在前面加“大、二、三……”，最小的一般称为“么”。在亲属关系里，与祖父同辈的男性都可以在表亲属关系的称谓词后加“公”，组成亲属称谓词，如家公、姨公、姑公、舅公等。依次可以推出，与祖母同辈的女性则可以在表亲属关系的称谓词后加“婆”组成称谓词，如家婆、姨婆、姑婆、舅婆等。

(二) 父辈

成都方言中父亲和母亲一般采用“爸爸/老汉儿”、“妈”的方式来称谓。伯父和伯母一般称“伯伯/大爷”、“伯母/大嬢”。叔父和叔母一般称为“叔叔”、“婶婶”。姑父和姑母一般称“姑爷”、“排行+嬢”，例如“大嬢、二嬢”。舅舅和舅母一般称“舅舅/保保”、“舅母”。姨夫和姨妈称谓“排行+姨爹”、“排行+嬢嬢/娘”。公公和婆婆一般称“公公/老人公”、“老人婆/婆婆娘”。岳父和岳母一般称“老丈人”、“老丈母”。

父辈中男性多采用“爸/爷/伯”的称谓。《广雅·释亲》：“爹，父也。”由这三个称谓词可以得知，成都方言中原来用于称呼父亲的称谓词“爸/爷/伯”也可以用于称呼父辈的叔伯父。比父亲年长的兄弟的称谓词一般在排行前加“爸/爷/伯”，如大爷、二爷，或者大伯、二伯等，依次类推。比父亲年小的兄弟在排行后加称谓词“爸”、“爷”。最小的称：幺爸、幺爷。

父辈中的女性则多采用“妈/娘/嬢”的方式来称谓。“嬢”以前表示“母亲”的意思，在《木兰诗》中的“但辞爷嬢去，暮至黄河边，不闻爷嬢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在成都方言中，称呼母亲的称谓词基本都是“妈”、“妈妈”。母亲的姐妹按其排行可称为“大娘、二娘、三娘”等以此类推，最小的则称为“幺娘”。此外，在成都方言中，“嬢嬢”可以泛化为称一些比自己大很多的女性长辈或者是一些没有亲属关系的妇女。

(三) 同辈

成都方言中丈夫和妻子一般称为“男人/老公”、“婆娘/嬢、老婆”。哥哥、姐姐和姐夫一般称“哥哥/排行+哥”、“姐姐/排行+姐”、“姐夫”。弟弟和弟媳一般称呼为“弟娃儿”、“兄弟媳妇儿”。妹妹和妹夫一般称呼为“妹妹/妹儿”、“妹夫哥/弟娃儿”。表哥和表姐一般称为“老表”、“表姐姐”。丈夫和妻子的称谓“老公”和“老婆”与普通话称谓语无区别，但不同的方言有时候对同一个称谓词常常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如表示“妻子”意义的“婆娘/嬢”这个称谓词，在成都方言中带有粗俗歧视的意思，语义相较于“老婆”来说叫口语化且不太文雅，一般不用于面称，常用于背称。

在《西蜀方言》中对“哥哥”的称谓有“哥哥”、“胞兄”等，“弟弟”的称谓有“兄弟”、“弟娃”等。在表兄弟姐妹关系时，“表”和“堂”的称谓大多不出现，尤其是在称呼女性的时候，一般都全部统称为“姐姐”、“妹妹”。如果兄弟姐妹较多，可以在称谓前面加上姓名。在同辈排行时，一般使用“老+基数词”的形式：在基数词的前面加上前缀“老”字，组成“老大、老二、老幺”等，但是仅限于长辈对晚辈或者同辈和同辈之间的称呼。在成都方言中还有一个特殊用词“幺”，“幺”指同辈中排行最小的孩子，大多是父母对最小的孩子的爱称，表达了父母对最小的孩子的宠爱。所以“幺儿”这个称谓词在成都方言中就

引申为了父母长辈对儿女的爱称，不仅限于称呼最小的儿子。

（四）晚辈

成都方言中儿子和儿媳妇一般称为“男娃娃/男娃子”、“儿媳妇儿/媳妇儿”。女儿和女婿一般称为“女儿”、“女婿/门客”。孙子和孙女一般称为“孙儿/家孙儿”、“孙女儿”。外孙和外孙女一般称为“外孙儿”、“外孙女儿”。

子辈和孙辈一般采用“儿/女/孙/娃”的形式构成。《说文》“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儿头未合。”“儿”指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可以称作“儿”。《说文》：“娃，圜深目兒或吳楚之間謂好曰娃，从女，圭聲，於佳切。”古代多指美女，后来转变为“孩子”的意思，男女都通用。[2]在《西蜀方言》中对“孩子”的称谓有“娃娃、娃子、娃儿”等词。在成都方言中“媳妇”专指“儿媳妇”，大多数地区都不用于指称“妻子”，这与普通话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二、成都方言亲属称谓语的特点

（一）成都方言亲属称谓语的构词手段

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系统的构词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添加词根

在成都方言中对亲属称谓语添加词根的构词法主要分以下两种情况：（1）语义变化的情况：添加特定的词根后，亲属称谓的含义会发生变化。例如：词根“老”：在成都方言中，“婆”指祖母，加上“老”变成“老婆”，在普通话中意味着妻子。词根“么”：如“儿”加上“么”变成“么儿”，意义从“儿子”扩展到泛指“孩子”（包括儿子和女儿）。在成都方言中“么”则成为常用的亲昵附加词，如“么妹儿”指妹妹或年轻女子。（2）不改变其基本意义的情况，加上词根是为了表示尊重或排行，带有亲切感，但不改变基本语义。例如：排行最大的使用“大”，如“大爷”、“大嬢”。排行最小的使用“么”、“细”或“小”，如“么爸、么娘、么舅爷、么舅娘、么女儿”，在四川官话中表示年龄最小或排行最末。

2. 添加词尾

成都方言中大量添加词尾“子”构成亲属称谓，尤其是在词尾添加“子”的用法。成都方言中，在很多亲属称谓的末尾加上“子”，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例如，在成都方言中，“女娃子”、“儿娃子”、“孙娃子”等词在普通话中通常不会添加“子”。添加词缀“子”之后使得语言在发音上更具节奏感，这可能是适应或强化成都方言的音节结构。此外，这种用法也反映了成都方言区特有的说话习惯和文化特色。

3. 叠加

在成都方言中，不同的亲属称谓语语素可以相互叠加，用来表示与之相近的另一种亲属关系。这其中包括了三类关系的叠加：（1）姻亲与血亲关系的叠加。例如，成都话的“姐夫哥”和“妹夫哥”将姻亲称谓（“姐夫”、“妹夫”）与血亲关系（“哥”）结合，表达了亲密和大小关系。（2）血亲关系与血亲关系的叠加。“叔伯兄弟”含义为堂兄弟，“叔伯姊妹”含义为堂姊妹，二者结合了父辈兄弟关系（“叔伯”）和直系血亲关系（“兄弟”、“姊妹”），明确了亲属关系和长幼次序。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通过语素的叠加，不仅能够表达复杂的亲属关系，如结合姻亲和血亲，还能传达亲密感和确定家庭中的长幼次序。

4. 儿化词与儿尾词

讨论成都方言中儿化词和儿尾词,首先需要弄清楚两者的区别及其在亲属称谓中的应用。“儿化”指在一个音节中,韵母带有卷舌行为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3]在儿化词中,“儿”不单独成音节,它是通过卷舌韵母形成的特殊音变现象,称为“儿化韵”。儿化词在成都方言中经常用来表达昵称和亲密关系,如“老汉儿”、“么爸儿”等。在儿尾词中,“儿”作为词尾,独立成为一个音节,不具备表示昵称和亲密的特点。成都方言中使用儿尾词较少,如“妹儿”、“娃儿”。

儿化词和儿尾词在亲属称谓中的应用:(1)儿化词:多数情况下,儿化发生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2)儿尾词: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语境。例如,“妹儿”在不同语境下可指“妹妹”、“女儿”或“小姑娘”;“娃儿”可指“儿子”或“小孩”。(3)特别的儿化现象:在成都方言中,表示排行的数量词也可以儿化,如“大儿”、“三儿”,儿化后的意义与儿化前相似,但带有口语化的色彩。儿化词通常用于表示亲密和昵称,而儿尾词虽然用法较少,但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

5. 合称

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有时会添加一些表示复指的后缀,如“家”“伙”“些”等用于合称,来表示一种相互的关系,强调一种相互的行为。在成都方言中亲属称谓的合称用法及其特点包括以下几点:(1)合称的后缀。在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有时会添加后缀如“家”、“伙”、“些”,用于合称,表达一种相互的关系和行为。例如,“弟兄家”表示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兄弟伙”强调兄弟间的义气。(2)合称的应用。表示有血缘关系的几个人时,常用“数词亲属合称”来统称,使称谓变得简便和亲切。常见的合称例子包括:“两娘母”表示母女两人。“几爷子”表父子或父女几人。“几娘母”表示母亲和子女几人。“两弟兄”表兄弟两人。“两姊妹”表姐妹或兄弟姐妹两人。“两口子”通常指夫妻二人。通过添加特定后缀形成的亲属合称用法,不仅简化了称呼,而且增加了亲切感,反映出四川地区特有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特色。这种用法便于表达复杂的家庭关系,同时也富含地方文化的色彩。

(二) 语音特点

1. 声母混读

四川地区的人鼻音和边音混淆不分。四川地区在发音上的特点,尤其是关于鼻音、边音和翘舌音的使用情况,以及一些特殊声母的存在:(1)鼻音和边音混淆。在成都话中,鼻音[n]和边音[l]都发成鼻音[n]。例如,在这些方言中,诸如“老汉儿”、“老人公”、“老丈母”等亲属称谓词都使用鼻音。(2)翘舌音的混淆。在成都话中,翘舌音(例如声母“zh”、“ch”、“sh”)通常归入平舌音(例如声母“z”、“c”、“s”)。例如,成都方言中的“老丈人”、“叔叔”、“姊姊”等。(3)特殊声母的存在。在成都方言中,存在一些在普通话中不常见的特殊声母。这些特殊声母在拼接普通话声母时有独特的发音方式,例如在亲属称谓语中的“嬢嬢”的“嬢”念阴平。

2. 变调

在成都方言中还存在着叠音亲属称谓词的音调变化以及非叠音亲属称谓词的变调。首先,叠音亲属称谓词的音调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叠加形成的叠音亲属称谓词中,后一个字常变为轻声,如“舅舅”、“爸爸”等。但如果原调本身是阴平音,则不发生变化,如“哥哥”、“嬢嬢”等。其次,非叠音亲属称谓词的变调情况:例如,表示“姑父”的“姑爷”中后字通常变为阴平音。但在“姑老爷”中,“爷”仍保持原调。

（三）同形异指和异形同指现象

1. 同形异指现象

语言中有些词在反映客观事物时，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分别指称不同的事物，亲属称谓也是如此。把一个称谓词用于称呼多类亲属的现象，即亲属称谓的同形异指。[4]在成都方言亲属称谓语中就存在着一些同形异指的现象。在成都方言中，无论是面称还是背称称谓语中，同形异指现象普遍存在。例如，“爷”可以指伯父或叔父，“娘/孃”既可以指伯母也可以指叔母。同形异指现象在四川地区的亲属称谓语中十分常见，体现了这些方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现象说明即便是形式相同的词汇，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方言背景承载多重含义，反映了语言在文化传承和地域差异中的多样性。

2. 异形同指现象

异形同指是一种与同形异指截然相反的现象，指的是同一类亲属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不同词形进行称呼的现象，类似于汉语中的近义词现象。在成都话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无论是面称还是背称，都存在一义多词的情况。例如，“排行+爸/爷/爹”可以表示“伯父”或“叔父”，“排行+娘/妈/孃”可以表示“伯母”、“叔母”或“姑姑”，“婆孃、老婆”可以表示“妻子”。这些不同的称谓词在出发点、语体、语感色彩上都有所不同，充分展示了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选择使用何种称谓时，应充分考虑语境和交流对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三、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文化内涵

（一）地域文化

语言作为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亲属称谓语作为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观念。在中国各地区方言中，亲属称谓语有着丰富多彩的语音和词汇形式，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以四川官话为例，其亲属称谓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独特的称谓词汇，如“挑脑壳”、和“姨抬”，是四川地区特有的语言现象。这些称谓的形成与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农耕文化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四川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研究四川官话中的亲属称谓语，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四川地区的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更能够探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在各种方言和语言中都有所体现，是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传统文化

在古代中国宗法制度中，血缘关系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中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受重视。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亲属称谓语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古代社会，男性被视为家族的代表，而女性则从属于男性。男性在家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在嫁入夫家后则没有独立的身份。比如“主人家”、“男人”等称谓，充分反映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家庭观念。女性的身份随着婚姻发生变化，她们在嫁人后通常会改变姓氏，从父姓改为夫姓。她们的称谓往往相对于男性称谓而定，并且通常是卑称。例如，“婆孃”、“老孃儿”、“屋头人”等称谓，都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和性别角色。这些称谓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的不平等现象，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结构仍然根深蒂固。

（三）移民文化

四川方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深受移民方言的影响。移民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而且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些语言和文化与当地语言相互融合，推动了方言的发展。方言的亲属称谓语发展，特别是四川方言如何受到移民和外来方言的融合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方言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成分的吸收是不可避免的，这导致称谓语中既包含本土特色，又融入了外来特点。四川方言受到了来自不同地区方言的影响，包括江西、广西、广东、湖北、湖南和福建等省份的方言。其中，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等方言对四川方言的影响尤为显著。例如，在成都方言中，“表哥”和“表弟”被称为“老表”，这是受江西移民的影响；成都方言中，“干爹”和“干娘”被称为“保爷”和“保娘”，这则是受到闽语的影响。在川东地区，“儿子”或“孩子”的称呼与湘方言有关。四川方言的亲属称谓语不仅体现了本地文化和语言的特色，还深刻反映了不同地区移民方言的影响，展示了语言的动态发展和文化交融。这种语言融合现象突显了移民和文化交流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证明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四、结论

亲属称谓词是亲属关系的象征符号，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且在语言学和文化学层面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对其构词手段进行了总结，包括附加、儿化、叠加和合称等形式。在语音方面，总结了声母混读和变调等特征。此外，还发现了语用方面的异形同指和同形异指现象。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与汉民族共同语的亲属称谓语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本文仅对一个点进行了考察，但仍为进一步全面了解成都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奠定了基础，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1][英]钟秀芝:《西蜀方言》[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
-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4]焦国荣:北方方言中亲属称谓的“同形异指”现象初探[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05.

A Study of the Kinship Terms in the Chengdu Dialect of Sichuan

Wu yao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Chinese kinship terms are a set of specialized appellations based on blood and marriage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i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itself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word formation, and semantic connotation. In addition, as a symbolic symbol of culture, kinship terms also embody the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 specific reg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alect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s of kinship terms, which not only reveals people'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objective things, but also deeply reflects the different regional humanistic styles of different pla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ellation language of Chengdu dialect,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ts kinship terms. By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lexical,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kinship terms in the Chengdu dialect,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ustoms, folkway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such as implicit valu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but also helps to protect and inherit local culture.

Keywords: Chengdu dialect; Kinship terms; Cultural connotation.